

张建伟：印尼民主打破了哪些政治魔咒？

2019年5月1日 3:30 AM 文/张建伟 来自/联合早报



4月17日，五年一度的印度尼西亚大选在平静的氛围中结束。（档案照）

4月17日，五年一度的印度尼西亚大选在平静的氛围中结束。虽然正式的选举结果要等到5月才公布，但到目前为止，印尼在选前与选后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暴力冲突。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印尼已经实现了民主巩固，不大可能会退回到威权政治。

这个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亚细安最大的国家，在1999年开启了“第三波民主化发端以来的亚洲国家最有影响的民主转型。”此后，这个国家在民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根据 Polity IV 的评分，1999年民主转型以来，印尼的得分一直稳定在6分以上：其中1999年至2004年的得分为6分，2005年之后的得分一直维持在8分。Polity IV 的评分区间为-10分至10分，得分在6分以上的属于民主政体。

印尼在民主道路上的成功，打破了人们对民主化的诸多成见。长期以来，这些成见像“政治魔咒”一样，困扰着威权国家的精英与大众，成为这些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巨大认知障碍。因此，对印尼的民主经验进行提炼与反思，不仅具有学术上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政治魔咒之一：伊斯兰主导的国家不适宜民主政治。关于伊斯兰是否与民主相容的问题，学术界观点不一。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两者对立不相容。如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就认为：“伊斯兰历史从未有过任何类型的议会或代表机构、自治团体，只有臣民对当权者的绝对服从。千百年来，‘专制要好于无政府’和‘无论是谁当政，服从当权者皆是不容置疑的’等理念主导着伊斯兰政治思想。”

法国学者阿里·卡赞西吉尔也认为，多元民主制度在穆斯林国家是较为罕见的，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处于绝对君主制、军人威权制等各种类型的威权统治之下，只有土耳其等少

数国家建立了民主体制。而且，即使作为中东地区实现民主的典范国家，土耳其也遭受着周期性军事政变的威胁，民主制度显得极为脆弱。

印尼民主的成功，显然打破了上述“魔咒”。印尼是世界上拥有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穆斯林在其本国人口中占大多数（88%）。在印尼，伊斯兰与民主不仅不对立，反而呈现出相得益彰的关系：伊斯兰在印尼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民主体制给伊斯兰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

在威权统治时期，伊斯兰政党受到严格控制，处于极其边缘性的地位。比如，在苏卡诺时代，政府将伊斯兰政党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限制伊斯兰政党的发展，以此来稳定其政权，致使伊斯兰政党的作用极其边缘化。到了苏哈多时代，政府当局继续沿用打压政策，并实行了党禁政策，使伊斯兰政党的影响力进一步边缘化。

民主化开启之时，由于政府取消了对政党发展的严格控制，伊斯兰政党有了重新崛起的机会。这些伊斯兰政党抓住这次机会，成为了参与多元权力竞争的重要行动者。正如印尼学者所言，穆斯林的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是民主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只有当民主继续是“唯一游戏规则”时，伊斯兰政党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并拥有表达伊斯兰政治愿望和利益的空间。也就是说，伊斯兰与印尼的民主进程不仅不对立，反而呈现出相得益彰的关系。

政治魔咒之二：族群成分复杂的国家不适宜民主政治。很多人都认为，族群成分复杂多样的国家难以实行民主制。民主转型的开启，使原先被威权压制的族群获得了政治表达的自由空间，其中产生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不同族群会通过组建政党来竞争权力。而族群型政党常常会成为族群冲突的导火索，尤其是对于转型中的新兴民主国家而言，族群型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常常会引发族群冲突，败选的族群型政党则可能因感到边缘化而诉诸暴力方式，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利维坦”重现——威权式一党制或军事政变以维护秩序的名义出现。

拉布什卡（Rabushka）与谢普索尔（Shepsle）认为，族群型政党加剧族群冲突的核心机制在于族群竞价机制（ethnic outbidding），族群型政党的领导精英为了本人或群体的利益，常常在选举中提出过高的承诺，最终破坏了民族团结并导致民主崩溃以及种族隔离制度。

霍洛维茨（Horowitz）则认为，族群型政党加剧族群冲突的核心机制在于其“传染机制”，对于多元族群社会的选举而言，一旦某个政党以族群型政党的面目登场，其他政党在面对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同样也可能转向族群动员，由此导致整个政党体制的族群化，最终导致政治稳定的失序以及民主体制的崩溃。

印尼民主的成功，显然也打破了上述魔咒。作为典型的群岛国家，印尼由 1 万 7508 个岛屿组成，绵延 5200 公里。2018 年印尼的人口为 2.6 亿，是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人口大国。这 2 亿多的人口分属上千个族群，有着数千种语言和方言。而且，在近代遭受殖民统治之前，这些族群从未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内生活过。因此，除了共同的被殖

民经历之外，这些千差万别的族群缺乏共同的历史经历，作为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资源。就文化与族群多样性而言，印尼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国家之一。

很难想象，对一个族群如此复杂的国家来说，启动民主化所带来巨大的风险将如何得到规避。东帝汶、亚齐、西巴布亚等地区都长期存在着分离主义运动。不出所料，在印尼启动民主转型之际，这些运动也借机出现高涨之势。比如东帝汶就在 1999 年发起了独立公投，最后的结果是 78% 的投票者支持独立。西巴布亚也提出了独立公投的要求，亚齐省则干脆直接发动了武装叛乱。然而，最后除了东帝汶获得独立之外，其他两地都得到了和平解决。印尼并没有像南斯拉夫等国那样陷入内战乃至解体的命运。至于其中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跟印尼较为宽容的政治文化有关。

政治魔咒之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不适宜民主政治。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是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重要动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赛特最先提出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的理论命题，在他看来，经济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变化，这些变化将有利于民主转型和巩固。

基于对欧洲国家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比较，李普塞特发现：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更有可能是稳定的民主国家，而经济上较不发达的国家更有可能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即在民主政体与威权之间变换。简而言之，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在富裕国家更有可能获得维持，而在穷国则更可能面临崩溃的命运。

印尼民主的成功，显然再次打破了上述魔咒。从各项经济指标来看，印尼显然都不属于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在启动民主转型时（1999 年），印尼的人均 GDP 仅 671 美元，而同期的发达国家新加坡为 2 万 1800 万美元，甚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也达到了 2032 美元。而且，即使到了 2017 年，印尼的人均 GDP 也只有 3859 美元，在 11 个东南亚国家中位列第五名，而此时新加坡的人均 GDP 已达到 5 万 3880 美元，泰国也已经达到 6336 美元。因此，现代化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印尼。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印尼民主转型的动力更多源于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尼的经济开始在崩溃的边缘徘徊。虽然金融危机不是苏哈多政府下台的直接原因，但是其作为导火线引发了雅加达城市的混乱。

苏哈多政府内部成员倒戈，其忠实的伙伴，包括互助合作会、全国兄弟基金会等明确要求苏哈多交出政权，长期支持苏哈多的军方也表明反对苏哈多的统治，要求苏哈多顺应民意，主动辞职，否则将对苏哈多进行弹劾，所有矛头共同指向苏哈多的统治。由此，苏哈多被迫辞职，印尼的威权统治就此宣告结束。

印尼所创造的民主奇迹，打破了很多施加在后发国家身上的政治魔咒。2010 年 4 月，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上，时任印尼总统尤多约诺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印尼人民曾满足于待在威权体制的“舒适地带”，并被灌输这样一种认识：印尼的文化和历史环境并不适宜推行民主政治。然而，印尼人民根深蒂固的民主本能，最终还是被唤醒。

走上民主之路的印尼人民，不仅自由而热烈地将民主视为给定的事物，而且日益将自己视为新政治体制的主人，并准备在民主受到威胁时奋起保卫它。人最终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环境的奴隶，祝福可敬的印尼人民。

（作者是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葛红亮：印尼大选中的政治保守主义及其落败

2019年5月1日 3:30 AM 文/葛红亮 来自/联合早报

4月17日，印度尼西亚同时举行正副总统和国会选举。虽然正式选举结果尚未发布，但印尼多家民调机构当日下午至晚间先后发布的非官方快速计票结果显示，寻求连任的佐科得票率为55%左右，以逾10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对手普拉博沃；而印尼选举委员会早些时候在官方网站发布的初步计票数据，同样显示佐科得票过半。这就表明佐科寻求连任成功，而操弄政治保守主义的普拉博沃在本次大选中落败。

近年来，印尼政坛受制于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深刻影响，是印尼政治发展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2017年印尼雅加达首长选举则是这一倾向加剧的最重要例证，同时也预示着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同样也会影响本次印尼大选。果不其然，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在此次大选竞选过程及投票后，有着多方面的展现或影响。

首先就是“身份政治”。此次大选与2014年大选类似，针对佐科的“身份”攻击也是屡屡不绝，有的传闻说佐科具有中国人血统，有的传闻还说佐科是一名共产党，而这显然是2017年雅加达首长选举中，阿尼斯及其背后操弄者攻击钟万学“双重少数”的翻版炮制。

其次极端宗教思想作祟下，印尼街头集会和游行不断。在2017年雅加达首长选举中，极端宗教思想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裹挟前进，而普拉博沃及其背后的政党与支持者在发起街头集会和游行方面的手段非常娴熟，也最终尝到了甜头。2017年迄今，印尼雅加达街头也曾多番上演大规模集会和游行，而在这次大选非正式结果公布后，普拉博沃及其支持者也组织了集会和游行，并在集会中大肆指责选举“不公”。

再者，宗教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也影响了此次大选候选人组合的选择。此次大选竞选中，佐科由印尼斗争民主党及其盟友党派推选，他的竞选搭档马鲁夫·阿敏则是印尼伊斯兰学者委员会主席，更是一位极有声望的伊斯兰宗教长老。显然，佐科这样的选择除了背后政党联盟内部博弈和抉择外，显然也是基于对印尼政治发展中日渐浓厚的宗教因素和保守主义的考虑。

最后是保守主义主导下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普拉博沃在与佐科两次“争雄”的过程中，祭出了“印尼优先”的大旗，并以此指责佐科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对外经贸往来，而其

中以“中国因素”最为凸显。在这一方面，普拉博沃一方面抨击佐科政府过度依赖中国，另一方面则表示如当选总统，将对相关中资项目进行重新审查及检讨中印尼两国贸易往来及其结构。

虽然如此，极端宗教思想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却未能将2017年雅加达首长选举的胜利和投机延续到此次正副总统选举中。同样的操弄手段，阿尼斯击败了钟万学，普拉博沃却没有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佐科。究其原因，除了“身份政治”失效和印尼人民忧惧于极端思想和保守主义的冲击外，佐科过往五年的执政成绩及由此而来的高支持率，无疑是其胜选及普拉博沃难以获胜的首要原因。

大选中，与普拉博沃简单的“反对策略”相比，佐科组合对于未来施政有着清晰的考虑，而印尼选民则基于对佐科执政成绩和个人品格将选票投给他。实际上，这就是世俗化政治的发展逻辑，也同样是印尼立国哲学的体现。因而，在很大意义上，此次大选也是对印尼民众对“班查希拉”（Pancasila，建国五原则）——“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持以何种态度的检验。

当然，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在此次大选中落败，并不意味着极端宗教思想和保守主义政治就消失殆尽或一蹶不振了，它们依旧在裹挟在一起并深刻影响印尼政治发展；而在佐科政府未来执政中，这方面的影响与挑战依旧是必须慎重处理的首要议题之一。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任职于广西民族大学亚细安研究中心）